

现代文学教学参考书之一

魯迅研究叢稿

吳 穎 著

韩山师专学报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九月

现代文学教学参考书之一

鲁迅研究丛稿

吴颖著

韩山师专学报编辑部

目 录

前 记.....	1
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	3
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 几个主要论点.....	34
略谈鲁迅文评的风格	58
谈《故事新编》里的几个形象.....	64
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71
再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90
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 ——三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	105
《故事新编》研究诸问题的 第四次商略.....	121

前 记

一九五六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我有了一个业余的学习研究鲁迅的打算，并就《故事新编》和文论方面写了几篇文章，有一部分当时还发表了。五七年初，我和一个省级人民出版社订了《鲁迅论文艺问题》和《〈故事新编〉研究》两本小书的合同。到这年秋天，前一本已写成，包括八篇文章，书稿已送到出版社，并有一个省级文学杂志拟先发表其中的《鲁迅论杂文》等篇。后一本，除了在《文艺月报》报等刊物发表的两三篇之外，曾经在未有注释本的情况下，花力气去查考与作品有关的“古事”和“今事”，作了许多札记，并把八篇作品分成几个类型，开始着手写几篇专文，以便合成一本。但这年冬，我跟许多同行一样，遇到一个历史的“误会”；于是，拟发的文章发不出，已成的书稿不出版，并且连同其他的草稿、札记等一起“散佚”了。

一九七九年春末，在三中全会的东风吹拂下，政治上的“误会”消除了。但当我重新拿起了业余的笔时，出自对“文革”的“评红热”的内心的厌恶和反感，因而一动手就去弄《红楼梦》问题。但对鲁迅《故事新编》仍有注意。八〇年，写了一篇关于《故事新编》的“三论”。八一年，写了一篇关于鲁迅对《红楼梦》的看法。去年，觉得对国内的鲁迅文论研究还有些话要说，便着手编了一本《鲁迅文论摘选类编》，并写出了一篇《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又因为对鲁迅百年诞辰前后国内关于《故事新编》中的一些权威看法有异议，因而又写了一篇“四论”。

现在，借着学校要印点教学参考书的机会，把五六、五七两年的“子遗”四篇，与近两三年写的四篇，共约十万字光景，印在一起，算作学习鲁迅的一点“痕迹”。至于今后是否再搞点鲁迅；将来能否弄个公开出版的论文集并把这小书中的一部分文章选入；……这些，由于工作负担较重，而仅有的一点业余时间还要弄《红楼梦》，还要搞个古籍整理的题目，因而目前还很难有确切的打算。

记得一九七八年，当我尚在等待“照顾安排”的春节那天，日间还偶有二三旧友来聊天；但到晚间，甚觉无聊，颇涉浮想，因而凑成一首只有几位友人见过的《念奴娇——戊午早春书怀》：

东风万里。又江南草绿春回大地。翘首云天神正往：健隼扶摇展翅。琐琐城狐，区区社鼠，捣鬼将何计？庆父既除，乾坤一派生气。 飞扬应记当年，九天抚髀，岂乏凌云意？褊狭王伦难共处，转眼剩言流水！沧海珠沉，嫫嬛筒散，半杆成隔世。这回不算，从零也要开始！

这里的“嫫嬛筒散”是说，自己约近万种的藏书两毁于“兵”（“红卫兵”和“民兵指挥部”），现已荡然无存，要重新“开始”只能“从零”。幸好，几年来，虽“从零”但好歹也总算“开始”了。只是，那时我对“城狐”“社鼠”的估计，现在看来，真是天真得可以；何止“琐琐”“区区”而已？！他们的能量还很大，正如十二大时陈云同志所说，遇到“气候适宜”，他们就还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呢。……

但这样写下去，似乎有点“离题”，就此带住则个！

作者，1983年7月22日，记于潮州韩山石楼

马克思主义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

最近，读了李何林同志的《普及鲁迅著作提高鲁迅研究水平》（下简称《提高》）之后，有了一些想法。李何林同志是当代屈指可数的鲁迅研究的老专家之一，正如《社会科学辑刊》文前简介所说，李同志“介绍了国内少数中文系大学生对鲁迅的一些不正确看法以及国外歪曲诬蔑鲁迅的言论，给予廓清和批驳，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对于当前消除鲁迅研究中的思想障碍，推动研究工作的开展颇有指导意义。”这个介绍，与《提高》中所提供的多数论点和维护鲁迅的坚定的感情态度，笔者都是同意和欣赏的。但是，《提高》中的有些论点和提法，笔者却未敢苟同；而这些论点和提法，却涉及了当前鲁迅研究中一些带原则性的问题，有必要提出来，认真加以探讨。

例如，《提高》中说：

……有的大学生认为“鲁迅后期的文学成就不大”（这和我们现在全国研究鲁迅的人的看法正相反，我们认为鲁迅后期的文学成就大），“觉得鲁迅前期的作品比后期有份量、有价值、有味道、更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后期的杂文的意义主要在政治上，主要是和别人论战的文章”（他这个意思是说后期的杂文意义主要在政治上，好象因此意义就不大了，这与我们衡量作品的标准也不一样），某些地方还蛮偏激，骂了很多，被骂的人多数又都是人民内部的。

而且觉得，鲁迅晚期在这方面占去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很可惜”（我们觉得鲁迅后期的杂文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

……“关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鲁迅实际上也是赞同的，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和内部规律”（应当指出，在最近两三年内，文艺思想界有些同志根本否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位同学也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①。

（引者按：上引文中，双引号内的是某一位中文系大学生的意见，括号内的是李何林同志的意见。）

诚然，那位大学生的意见，虽然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如认为鲁迅前期的作品“有份量、有价值、有味道、更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但他用“前期”来贬低鲁迅后期杂文的意义——包括“在政治上”的意义，那确是偏激的，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而且，那位大学生的意见虽然也有符合实际的正确一面，如鲁迅的确“实际上也是赞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但他认为后期鲁迅“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和内部规律”，就并不符合实际，因而是错误的。鲁迅的文艺思想和当时的左翼文艺理论家（甚至包括在当时对鲁迅评价最接近正确的瞿秋白）的最主要的不同，就在于鲁迅虽然“赞同”文艺“也可以”“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②，但他从前期到后期始终坚持文艺的审美特征，坚持文艺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而这正是文艺的最根本的“审美价值和内部规律”。这里面，“对现实关

系的真实描写”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恩格斯语），就是鲁迅文艺思想的核心，也就是“文艺的审美价值和内部规律”的核心。这方面，鲁迅曾有大量的言论和实践（下文将详细讨论）。只要说清楚这方面的事实，就能够更正那位大学生对鲁迅认识的偏颇。

然而，《提高》却不但在语意之间流露出贬低前期鲁迅思想的价值，而且在前提上首先就承认后期鲁迅确是“忽视”了“文艺的审美价值和内部规律”，确是单打一地“赞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又认为“工具”说是正确的，言下之意是不应加以怀疑和不许进行讨论的。这其实是“一点论”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方法；而运用这种方法，客观上就要给鲁迅涂抹上单纯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左”的色彩。这种主观上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鲁迅，但运用得并不十分正确，因而客观上给鲁迅涂上“左”的色彩的方法，就是多年来鲁迅研究中存在的一个带原则性的、至今尚未得到较彻底解决的问题。

无可争论，研究鲁迅及其文艺思想，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然而，怎样才是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观点，显然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像上引《提高》中所提供的方法，既未能准确地阐明鲁迅的文艺思想，也未能准确指出一些青年对鲁迅误解的症结所在。因此，讨论一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鲁迅及其文艺思想，在当前，看来还是一个很必要的具有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文试图联系一下这些年来的一些实际情况，针对这方面的问题说一些意见，未必正确，欢迎指教。

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鲁迅，并且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影响很大的，当然要推瞿秋白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以何凝为笔名发表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下简称《序言》）^③。这篇在鲁迅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性的论文，对鲁迅思想的实质及其发展道路，对鲁迅杂文在当时革命斗争中的历史贡献，对鲁迅在当时文艺界以至思想界的历史地位，都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评价，其思想理论水平，大大超过了当时各种倾向的包括左翼文艺理论家们对鲁迅的认识和评价。这在鲁迅研究史上，是需要大书一笔的。尽管这篇《序言》只谈了鲁迅一九三一年以前的作品，未能包括了对鲁迅最光辉的后期中最后五年的业绩的评价，其中有些论点也并不确切，但从总体上来说，《序言》代表着鲁迅生前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鲁迅的最高水平，却是断然无疑的。前两三年，个别同志对《序言》肯定得不够，否定得较多，那是不符合历史观点的。

但是，作为一篇产生于一九三三年的论文，在八十年代的今天看来，客观上显然也存在着一些历史的局限性，那也是毋庸讳言的。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一方面是限于当时文艺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美学水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瞿秋白同志当时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掌握运用上还存在着一些偏差。他强调文艺对革命运动的实践作用，强调文艺的倾向性和作家的政治立场，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本来也是必要的；但强调得过分，而且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文艺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认识

作用和审美作用，忽视了作为文艺的内部规律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重要意义，在实际上就是不承认“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的真实性是倾向性的基础和前提，从而形成了对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逻辑关系的认识上的倒置。比如，他在1933年以静华为笔名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就说：“客观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是有政治的立场的，——不管作家自己是否有意的表现这种立场；因此，如果把‘有倾向的’解释成为‘有政治立场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不反对这种‘倾向’，而且非常之鼓励文学上的革命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大作家，从亚里士多德到海涅，都是极端有倾向的，然而这种倾向应当从作品的本身里面表现出来。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文学，正是善于表现革命倾向的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学。”这在实际上是否认了非倾向文学的存在，而且明显是把“革命倾向”置于“客观的现实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之前，颠倒了真实性和倾向性的逻辑关系。

又如，他在《论弗里契》一文中，这样去肯定弗里契下述论点的“正确”性：

意识反映实质，然而意识反映着实质，同时还在影响实质。因此，那些从“认识”方面出发的对于艺术的定义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自然，一个阶级有着上层建筑，可以去认识自己阶级的某些方面，可以去认识别的阶级的“我”，然而，这仅仅是一种附带的作用；——阶级在社会之中行动着，首先就在为着自己的生存和政权而斗争，而不是做旁观者，只处于认识的状态之中。（旁点为

引者所加)

在这里，瞿秋白同志所强调的，显然是文艺的“影响实质”的“行动”作用即革命实践作用，而把文艺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认识”方面的作用，看作“仅仅”是“附带的作用”，至于审美方面的作用更未进入他的视野之内。

还有，瞿秋白同志在《〈子夜〉和国货年》中肯定“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的“很大的成绩”在于“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这显然是把文艺看成是从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实际上是不承认作品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作用。上述这些论点，作为一些有代表性的论点，在解放以来的文艺界还有许多同志在继续坚持，也运用于对鲁迅及其文艺思想的研究，甚至到八十年代的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坚持；象本文谈到的李何林同志的文章，就还包含有相类似的论点。

不但如此。《序言》对鲁迅思想的实质及其发展道路，还有一个著名的结论——

……鲁迅……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应该说，当时的左翼文艺界对鲁迅的看法非常分歧、混乱，其中有些看法还是很错误的；很多同志不承认鲁迅是革命

文学家，而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以至是资产阶级的作家；更甚的，象郭沫若同志的以杜荃为笔名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孽》一文，还“完全决定”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而且还是一位主张“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的“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同志的《序言》包括上述著名的结论，第一次地论定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伟大的“革命家”，从而初步统一了各种各样的混乱的看法，明确了鲁迅在左联中的领导地位，让后期的鲁迅在文化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大力肯定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结论，解放以来，也一直是成百次地被引用，在鲁迅研究上发生很大的影响。

然而，应当指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这个结论是不确切、不完善的。因为，“进化论”仅是鲁迅前期思想上所受到的一种影响，他前期也受到别的思想影响；而且，“进化论”也未能概括鲁迅前期思想的主要特质。同样，“阶级论”最多只能概括鲁迅后期思想的一个方面的特征，而未能概括“鲁迅式”的思想的精深、博大、丰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诸主要特征，因而不免显得有点“以偏概全”。这一点，是直到近几年中，才有人略略提出的。但是，由于这个“阶级论”的结论至今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同时，它和解放后广为传播的一些带有历史局限性的偏颇的文艺理论——如认为文艺只有阶级性而没有共同的人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以至“唯一”）等——结合起来，就更成为

金科玉律，许多年来没有人敢于指出它的不确切、不完善。这样，虽然最近已有人略加指出，但这只能算发现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因此，直到现在，象李何林同志这样的研究鲁迅的老专家，其实就还是在“阶级论”的结论中兜圈子；这在客观上就还是在继续给鲁迅涂抹上一些“左”的色彩。于是，当代有些文科大学生对鲁迅研究工作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当然，目前有些大学生对鲁迅的看法确也有偏颇之处，这应该解释、引导；必要时，也可以通过批评，加以纠正。但是，这些大学生的意见中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应该接受；对于一些虽说得偏激、片面但不无值得参考之处的意见，也应该引起鲁迅研究工作者的反思，这才能使鲁迅研究工作克服缺点，逐步前进。然而，象李何林同志那样，既未能完全摆脱某些教条主义的束缚，又采用了简单化的“顶回去”式的批评，尽管他的动机是好的，但那效果，就不但不能缩小了某些大学生和鲁迅的距离，减少了他们对鲁迅的误解，反而会拉长了和鲁迅的距离，增加了对鲁迅的误解。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鲁迅的工作上，讨论和澄清对鲁迅的某些“左”的庸俗社会学的阐释，揩拭去过去一些同志善意地涂抹在鲁迅身上的某些“左”的色彩，在当前还是一个重要的工作。

二

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来说，“阶级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阶级论”——阶级观点仅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构成部分。按通常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了有机联系着的两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人认为两者是统一的，但这个问题此处不谈。）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简称历史观点，就是观察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关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最根本的观点。恩格斯曾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④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他们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条注文中强调指出：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⑤说是“唯一的”，可见他们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也可见“阶级论”或阶级观点无论如何重要，也只能是历史观点的构成方面或构成部分，并且只能以历史观点作为前提和先决条件。因此，分析任何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只有一种分析作为历史过程的阶级关系的阶级观点，而没有任何一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的“阶级观点”。如果运用阶级观点时不以历史观点来作为前提和先决条件，那就无法解释人类的第一个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的奴隶社会，何以是无阶级的原始共产社会的一个历史的进步；也无法解释在同一个阶级社会例如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何以初期的封建剥削阶级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的，只有末期的封建剥削阶级才是落后的以至反动的。可见，无论是作为体系的构成，或者是作为分析社会问题的理论方法，历史观点都是高于和大于阶级观点的。

如果以上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悬“阶级论”为极则，认为“阶级论”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极致，这从理论上说是片面的，简单化的，不完善的。其实，鲁迅思想发展成

熟阶段的后期十年，决不仅仅是“阶级论”，而且是包括了“阶级论”的唯物史观；同时，作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鲁迅的美学观，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相一致的。可以说，鲁迅前期的思想包括文艺思想，就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重要因素，而后期的思想，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许多基本原理是相通的和一致的；而且，无论是后期或前期，鲁迅的思想并不仅仅是某一程度上去“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这个“相通”和“一致”，是一直保持着鲁迅思想的广博性、深刻性和丰富性的个人特色的。因此，鲁迅的思想发展史，就是“鲁迅式”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包括阶级观点的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历史，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和飞跃——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研究鲁迅，也就是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去研究“鲁迅式”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包括阶级观点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历史，分析鲁迅从前期到后期的思想实质、特质及其发展诸阶段、诸层次的特征、特色，并阐明这些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发展和文化思想发展）中的意义。如果现在不是这样，而是坚持像五十年前那样，把鲁迅前期的思想仅仅概括为主要是“进化论”和“个性主义”，把后期的思想仅仅概括为主要是“阶级论”，那一定是以偏概全的；而用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结果必然要忽视鲁迅思想的丰富博大精深的个人特色及其社会意义，这在客观上就是用“左”的框框去缩小鲁迅的思想、鲁迅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意义，就是“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也就是让鲁迅的思想和理论的“个性”——个人特色“消融到原则里去”（均恩格斯语）。

那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包括文艺思想，可以看到什么特色呢？

这里，首先应该充分阐明的，是鲁迅的历史观点，无论是前期或后期，一直是和美学观点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须臾离开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特色，是鲁迅思想和三十年代直到现在的某些“左”的庸俗社会学具有先天性的原则区别的地方，也正是鲁迅高于当时的所有左翼理论家和解放后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的地方。

按我们的看法，五四时期前后的鲁迅，尼采主义和进化论都给鲁迅以重大的影响，但这些只是鲁迅“拿来”的、“将彼俘来”并经过选择、改造的武器，并未成为鲁迅思想的实质性的核心。这时期的鲁迅的思想，实质性的核心性的思想，其实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的人道主义，而且是一种和个性解放思想交织在一起的人道主义。最典型地反映了鲁迅这思想的，是一九〇七年作的《文化偏至论》，他说：

……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扬精神。……^⑥

在这里，鲁迅坚持的是不失中国“固有之血脉”，而对外来的

新的东西则又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从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在“个性张”的基础上建立“人国”。这当然是辩证的历史观点，即立足本国、借鉴外来从而发展创新的观点。鲁迅在七十多年前的这一观点，甚至在现在还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这一在“个性张”的基础上建立“人国”的思想，毫无疑义，是一种结合着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在一九一八年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⑦；他的《狂人日记》以人性解放论作为主要的思想武器，他的《一件小事》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他坚信：“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⑧到了一九三三年，他还明确断定自己和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⑨。因此，用“人性解放论”来概括鲁迅五四前后的核心性的思想实质，既符合鲁迅言论的实际表现，也符合后期的鲁迅对自己的判断。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过分地强调“阶级论”，以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不敢去正视、分析和评价鲁迅的客观存在并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的交织着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就是“人性的解放”的思想，直到近几年，虽有人敢于提出这个问题，但其实至今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那些简单化的“左”的“阶级观点”，还盘踞在鲁迅研究的许多领域上耀武扬威。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鲁迅在五四前后的富有个人特色的人性解放思想，和他的立足本国、借鉴外来、发展创新的历史观点，这两者表现在这时期——从一九〇六年确定“弃医从文”时起——所作的《文化偏至论》、《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等的著